

R
505
100.7
2

三民週刊第一卷總目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第一期起至第十八期止

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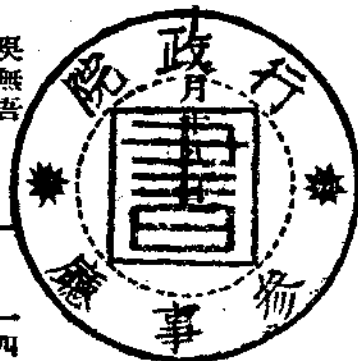
著者	期數	頁數
我們的主張	一	一—二
抗戰兩週年後	一	三—四
和平防共與復興救黨	一	五—八
最後勝利的基礎	一	一—五
左右逢源的共產黨理論	二	九—九
致渝中央執監委電	二	二—二
拖得下去嗎	六	二—二
我們的責任與行動	七	一七—一八
爲什麼反共	七	二〇—二二
雙十節感言	七	二二—二三
對於和平建國事業澈底的認識	七	二〇—二二
防民之口的後果	八	一—一
真實的行動	八	一〇—一一
中華民國之新生命	九	一一—一二
抗戰期間共產黨行動及其理論之剖視	九	一一—一二
乞靈於孔教	十	二〇—二二
抗戰必勝即應戰乎?	十	二〇—二二
總理誕辰演詞	十一	五—六
關於中國的國民性	十一	一四—一四
論反共	十二	六—九
許昌案譯	十三	二—二
汪精衛	十四	二—二
宋承	十五	一五—一八
朱丹	十七	六—八

國際與外交

英蘇談判之經過與展望	一	一—二
歐戰要爆發嗎?	一	三—四
世界各強國平時軍隊數額	一	五—八
巨變後的國際形勢	二	一—五
內閣改組後的日本外交	二	九—九
陣綫論者的輓歌	六	二—二
歐戰現況與將來的蠱惑	六	一七—一八
斯大林怎樣向希特勒屈膝	六	二—二
(二)	七	二—二
英國的參戰	七	二〇—二二
史太林往那裏去	七	二〇—二二
匈牙利的命運	八	一—一
還期望蘇聯什麼	八	一〇—一一
大英帝國外交的苦悶	九	一一—一二
三件悽絕的故事	九	一一—一二
德國之西格非陣綫	十	二〇—二二
歐戰與中國之前途	十	二〇—二二
巴爾幹半島上的外交戰	十一	五—六
獨立自主的外交	十一	一四—一四
歐戰第一月	十二	六—九
蘇聯的人口問題	十三	二—二
斯大林搶奪波蘭	十三	一五—一八

04326

吳無吾	一	一四—一八
吳無吾	二	六—九
補白	二	二〇—二〇
余志遠	三	一—三
吳無吾	三	四—六
虞子愚	三	一〇—一三
吳無吾	四	三—四
季剛譯	四	一一—一四
季剛譯	五	一三—一六
余志遠	五	五—六
張爾伯	五	七—八
燕麗譯	五	一一—一二
余志遠	六	三—五
張仲秋	六	六—七
郭戈果	六	一一—一五
白瑞光譯	六	一七—一八
汪精衛	六	一九—二〇
燕妮	七	一一—一三
戚世英	七	四—五
吳無吾	七	六—八
朱旭光	七	九—一二
白瑞光譯	七	一三—一四



600157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中華日報	七	一八一—一九	英德的經濟戰	白瑞光	十六	五—七
當前日本的外交	余志遠	八	二—四	德國之戰時經濟	一匡譯	十七	一六一—一七
縱橫捭闔的土耳其	吳無吾	八	五—六	國際現勢與中國	古 越	十六	八一—一〇
舉世矚目之美國動向	白瑞光	八	七—八	芬蘭的侵擾	白瑞光	十七	一〇—一一
美國中立之政治經濟意義	白瑞光譯	八	九—一一	美國對芬蘭問題之輿論	探銳初譯	十七	一一—一二
美國與遠東	吳無吾	十三	一一—二	國際局勢的新發展	吳無吾	十八	一二—一三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一)	成遠譯	八	二—四	波羅的海與蘇聯	一 匡	十八	一三—一四
(二)	成遠譯	九	一七—一七	蘇聯與遠東	張爾倫	十八	一四—一五
(三)	成遠譯	十一	一八—一九	歐洲局勢的回顧與展望	史 考	十八	一五—一六
(四)	成遠譯	十二	二一—一九	東洋史與中國事變	許昌業譯	十八	一六—一七
羅斯莫決的英國	吳無吾	九	一—三	關於磁性地磁	白瑞光	十八	一七—一八
蘇士談判停頓以後	吳無吾	十	六—八	中日關係	汪精衛	一	一九—二二
史太林的憂後自擾	秦維譯	十	二—三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			
史太林的掩敗	吳無吾	十一	一—三	前進目標			
蘇聯侵略形勢的檢討	西 生	十一	二—三	怎樣實現和平	汪精衛	一	二二—二四
意蘇蘇俄與歐局	張仲秋	十二	一—二	戰爭中的中日與國際	余志遠	一	二五—二七
歐戰第二月	吳無吾	十二	三—四	答問一	汪精衛	二	二八—三〇
暹羅特華的由來	后 亮	十三	一—四	答問二	汪精衛	二	三一—三三
(二)	后 亮	十四	二—四	論中日的經濟合作	曾寒冰	三	三四—三六
英國在南太平洋的防範	劉揚譯	十三	一—二	再論中日經濟合作	曾寒冰	三	三七—三九
張伯倫與德蘇協定	燕紀譯	十三	一—二	從抗戰到主和	金效晉	三	四〇—四二
歐洲的僵局與新發展	吳無吾	十四	一—二	民族平等與中日民族合作	會寒冰	四	四三—四五
新加坡的重要性	陳西生	十四	一—二	轉變後之日本對華外交	藏 珍	四	四六—四八
二次歐戰中之荷蘭與比利時	白瑞光	十五	七—八	蔣所接受的和平條件	藏 珍	五	四九—五一
二次歐戰中之巴爾幹半島的動向	白瑞光	十五	九—一〇	告海外僑胞	汪精衛	五	五二—五四
德國戰爭之原動力	高隱譯	十五	一一—一四	對外國記者談話與講演	汪精衛	五	五五—五七

中國的立場與日本的責任	胡蘭成	六	一〇二	民族主義的本質與任務	何道	十二	一九一
東亞和平與中日錯誤政策之改變	曾芝生	六	一六	中國社會組織與民族主義	曾寒冰	十五	三一四
對華政策的展望	司馬傑譯	九	一四	民族主義的本質與精神	曾芝生	十六	三一四
怎樣獲得和平	陶希聖	十	一三	大亞洲主義的解說	曾芝生	十七	三一五
中日和平與亞洲	胡蘭成	十	四五	總理的和平精神	鶴清譯	十七	五二五
所望于產業界諸君	汪精衛	十一	一一	政治與行政	李光黃	十七	九一九
和平運動之目的與手段	中華日報	十二	一一	和平戰爭與中國的統一	會資深	二	一八二〇
中國怎樣負起世界史的使命	宗嗣琮	十三	八九	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	周佛海	二	一八二三
答復質問	中華日報	十五	一一	戰由國民黨戰和由國民黨和之事實與理論	會芝生	五	一一四
中日濰戰的前途	顧政之	十六	一一	中國政治之前途	白瑞光	五	九一〇
各方面對於和平運動的認識	劉重道	十六	一一	民主政治與統一國家	劉重道	九	九一九
阿部首相的談話	中華日報	十六	一一	論行政制度之確立(一)	白瑞光	九	一一三
我們的態度	中華日報	十六	一一	(二)	白瑞光	十	一一五
侵華侮華和抗日仇日思想之消滅與中日和平	顧政之	十七	一一	(三)	白瑞光	十一	一一〇
恐日病與恐華病	中華日報	十七	一一	獨裁政治與民主運動	寧禮	十	一六一六
全面的和	中華日報	十七	一一	民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上)	白瑞光	十二	七一〇
和平主張的幾個階段	會芝生	十八	八九	(中)	白瑞光	十三	五二七
黨 義	傅君華	二	一七	(下)	白瑞光	十四	一〇二四
怎樣完成民族主義	中華日報	四	一一	中國政治及其改革	會寒冰	十二	一一二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專載	四	一一	我們所需要的國家	會芝生	十三	三一四
中國國民黨政綱	金效育	四	一一	和平建國事業中的改組政府問題	胡謙之	十五	一一一
對於六全代會宣言的兩點認識	劉重道	六	一一	以黨治國和以黨建國	劉重道	十五	一一二
大亞洲主義之精神	曾芝生	九	一一	改組政府問題	中華日報	十五	一一〇
論民生主義共產主義與中國社會	曾芝生	十一	一一				
論民生主義資本主義與中國社會	曾芝生	十一	一一				

組府問題	中華日報	十五	二〇一二	西南之經濟資源	章	十五	一四一四
民主政治之本質	劉重道	十七	二一二	日美貿易關係	補白	十七	八八八
和平建國偉業中國民黨的地位	會寒冰	十八	六一七	德國的煤炭	補白	十八	九一九
經濟				日本戰時財政經濟之總觀察	孫銳初	十八	一〇一二
和平戰事與中國經濟	會寒冰	一	九一一	歐洲各國對美戰債	補白	十八	二二二二
共產黨所倡的統一與經濟封鎖	補白	一	八八八	文化與思想			
重慶政府今年的預算總額	補白	一	一一一	兩年來國內文化界	望雲	七	一五一六
法幣跌價之原因與其前途	張向銘	二	一〇一三	(一)	望雲	八	一七二〇
法幣與英國	燕妮譯	二	一四一四	(二)	望雲	九	一八一三
努力增加生產乎	補白	二	一七一七	(三)	望雲	十	一七二〇
論民生主義的經濟體制	會芝生	四	五八八	(四)	望雲	十三	一〇一二
重慶物價逐步上增	補白	四	二二二一	(五)	望雲	十四	一五一七
中國失去振興民族工業的良機	長公	五	二二二二	(六)	望雲	十五	五一六
歐洲動亂與中國工業	會寒冰	六	八一〇	(七)	望雲	十六	一〇一三
歐洲各國每日的軍備費	藤	六	一〇一〇	(八)	魯長公	十一	三一三
外國在華紗廠比較	補白	六	一五一五	和平運動的思想主幹	會芝生	十四	三一五
一九三九年各國航船噸位	補白	六	二〇二〇	獨裁政治下思想之衰落	徐公美	十八	一六一八
華中開發公司	張爾伯譯	八	一五二六	中日文化教育關係之檢討	雪非	十六	一四一七
本年八個月全國船舶進出噸位	補白	八	一六一六	其他			
法蘇經濟談判的價值	補白	十	八八八	華僑對祖國的貢獻			
戰時的中國棉織業	燕妮譯	十一	一四一七	讀者通訊			
蘇對外貿易的總值	補白	十二	一〇一〇	一個維新政府官吏的自白	徐公美	八	二二二二
通貨膨脹	補白	十二	一一一二	人間地獄的嘉善四鄉	裴遠	十三	二二二二
滇緬鐵路本年內完成	補白	十三	一一一二	國共分裂的前瞻	裴遠	十六	一八一九

我們的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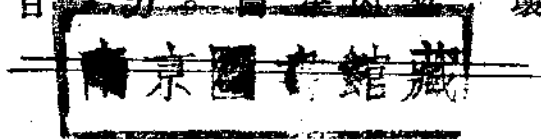
在國瀕危亡，黨趨毀滅的今日，任何忠實的國民黨員，愛國志士，都應當認清當前的處境，担負起自己的歷史任務。我們認定，維持民族的生存與獨立，必須完成現代國家的建設。中國國民黨是現代中國的保姆，故建國必先興黨。興黨建國是我們的目的，反共，和平，不過為達到目的的手段。所以我們當前的主張概括的說：即是反共，和平，興黨，建國。

一、反共 共產黨十餘年來，在中國所造的罪，作的孽，已是有目共睹。民國十六七七年間，共黨阻撓北伐的完成，自此以後十年來的流竄劫掠，遂使赤地千里，廬舍邱墟。共產黨受不住「圍剿」的逃亡，自諷曰「長征」。在所謂「長征」下的流寇騷擾，地方毀壞了，國力消耗了。這些惡因，生出的惡果，東北四省淪亡，七七事變，兩年來的中日戰爭，都接着來了。「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十多年來共產黨的劫掠燒殺，召來這次戰爭，我們還怨得誰？為「剿共」斷喪了國力，到如今喪師失地自食其果報。我們為維持國家的自由與獨立，應當竭盡所有，抗拒外侮。但是抗拒，不是召來，更不是像共產黨那樣先毀損抵抗外侮之力，而趁着外侮來時，擴展自己派系的勢力。汪先生說「利用民族意識，在民族意識的掩護下，來做摧殘民族斷送國家的工作，」在共產黨是以為當然的，因為他根本不知

有所謂國家，有所謂民族。」

我們認為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是造成統一國家的基本精神，應培植其有正當的發展，以為建設中國，奠定東亞和平的動力。共產黨反而利用之，摧殘民族，毀壞國家，破壞東亞和平，罪不容誅，我們誓當羣起剷除之。

二、和平 和平是建設國家，增進人類幸福必備的條件。無和平則無建設，無和平更無人類幸福可言。所謂「兵凶戰危」，如果國與國間的糾紛，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解決，我們為保持民族生存，國家元氣，為什麼不捨去戰爭而圖謀和平？中日戰爭，起因於日本無厭之求，中國迫而應戰。戰爭延續了二年，中日兩國有識之士都明白了，日本無能力征服中國，中國也無力驅逐日本出境。中日兩國間的問題不能以戰爭解決，已經存在的戰爭，更不能以戰爭結束。日本為結束戰爭感到困難，中國為支持戰爭感到困難。解除兩國困難的唯一方法只有休戰，只有和平，而且是開誠相商的真實和平。我們「對於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義，努力於轉敵為友，第一步恢復中日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三、興黨 近數十年來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國民黨一手造成的，沒有國民黨就沒有現代的中華民國，沒有國民黨十多年的統治，也沒有統一中國的進步與建設。同時我們也不否認在國民黨當權時掀起東亞空前的烽火——中日戰爭。國民黨被迫而從事中日戰爭，國民黨要挺身而出收拾殘破的中日戰局，國民黨創造的中華民國，國民黨要負責完成建國的使命。舊的國民黨在強力統治下，腐惡份子的侵蝕中，已失掉革命的精神，不能履行其神聖的使命，所以我們要復興中國國民黨，重振革命的精神，担負起建國救國的責任，挽回中國的頹局，東亞的厄運。有些人看到國民黨的某些罪惡，發為「毀黨」「滅黨」的呼籲。殊不知此等不可實現的夢想，徒滋社會的紛擾，阻礙國家的進步。因為中國國民黨已有五六十年的光榮歷史，擁有數百萬黨員，三民主義之深入人心，更在廣大民衆中蔚成堅固而不可拔之信仰。以滿清政府，北洋軍閥之壓迫摧殘，不能遏止國民黨之興起，以共產黨之殘暴，日本之侵略，不能動搖國民黨的存在，區區三數人，妄談「毀黨」「滅黨」，要知此負有歷史使命之時代寵兒，決不會爲少數人呵氣吹毀。我們是革命的國民黨員，不否認國民黨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因此我們承受鞏固國民黨的系統，肩起復興國民黨的大業，完成建國的偉大使命。

復興後的國民黨，不僅擺脫腐惡份子的侵蝕包圍，更竭誠歡迎黨外有志之士，翕然加入本黨或與本黨切實合作共同從事於建國大業之完成。建國大業經緯萬端，所幸我們已有建設新中國，新東亞的南針——三民主義可循。無論由三民主義的博大精深的內容上看，或由時代的需要上看，或由廣

大民衆之信仰與擁戴上看，三民主義仍是我們當前唯一的最
高政治綱領。

四、建國 三民主義是我們建國的準繩，我們要建設什麼樣的國家，三民主義及 總理全部遺教已經透澈的指示明白。總而言之，我們要建設對外獨立，領土及主權之完整，對內各民族自由聯合之統一國家。在這個國家內，全部總理遺教已爲新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建設預定下軌範。

以上四端，不過舉其犖犖大者，前二者反共，和平不過是達到興黨，建國之手段。復興國民黨之工作，在現在尤爲重要，因爲沒有健全的國民黨，好似行軍沒有總司令，建屋沒有工程師，我們將無由實行反共的活動，無由實現和平的願望，無由實行建國的工作。上述四者之中如分別緩急，復興國民黨爲第一要義。

三民的創刊，正是爲實行我們的主張，而新闢的園地。「興黨」「建國」的大業經緯萬端，戰後地方的復興，及國際關係的調整，均有待於精密之研究，詳細之討論。惟有透澈研究，始能明白問題之真像，惟有切實討論，始能產生正確的方案，因此，我們竭誠歡迎各方來稿。

歡 迎

批評， 介紹，

交換， 訂閱。

抗戰兩週年後

胡成蘭

八一三之役，日本不想打，中國也不想打，然而終於打起來了。打了起來之後，日本隨時想結束，中國也隨時想結束，然而一直打了兩年，打到現在。在打了兩年之後的八一三這一天，應當是中日兩國都能明白錯誤糾正錯誤的時候了。

日本的錯誤是在，他們一方面憎嫉英國支配中國，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承認英國是支配中國的，對於中日關係，他們不和中國商量，却去和英國商量，把英日倫敦談判的最後關頭看做就是中日外交的最後關頭，八一三就是這樣子打起來的。大家都還記得，七七事變那時候英日倫敦談判不過是僵化，所以日本當局還一再聲稱中日衝突，只是地方事件，避免擴大，而八一三之役則在英日倫敦談判正式宣告破裂之後兩星期，所以日本當局要聲稱打擊中國使之屈膝爲止了。日本當局如果是明白的，他們應當正確瞭解英日倫敦談判破裂的教訓，這個教訓是說，對於中日關係，日本只有直接找中國說話，纔是道理，找第三者說話是終於不會有結果的。英日倫敦談判之破裂是叫你轉過頭來去和中國開談判，不是叫你去和中國開戰。但日本當局的幹法剛好相反，甚至八一三之後不久宣稱的拒絕第三國干涉，也是對英國要挾而已，不是說將和中國作直接談判了。日本當局的這個觀念，到了去年十二月近衛聲明發表，纔算糾正了過來，它指出了中日直接交涉的途徑。最近天津事件談判之流產，更加證明了日本只有堅決遵守近衛聲明的原則，否則，找英國交涉，是找一百次也不會有結果的。

中國當局的錯誤是在她甘心受英國的支配，對於中日關係，他們不和日本商量，聽憑英國在那裏和日本開談判，把英日倫敦談判的

最後關頭看做就是中日外交的最後關頭。七七事變那時候英日倫敦談判還不過是僵化，所以蔣介石還要等待；八一三事變在英日倫敦談判正式宣告破裂之後兩星期，所以蔣介石也就奮起抗戰了。眼看英日倫敦談判破裂了，爲什麼不自己去找日本談判試試看，就這樣子打了起來呢？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悲劇。在八一三之前幾天，蔣介石在南京軍校演講，曾經痛哭過，要聽衆諒解他之所以不能抗戰；邵力子且奉命來滬，召集新聞界訓話，謂委員長在廬山之強硬演說，你們不可把它來機械的解釋，目前最要緊的是鎮靜人心云云；而且孔祥熙在倫敦打電報來，說萬萬不可對日開戰，這自然是英國的意思。但是不開戰，又有什麼辦法呢？英國沒有辦法。英國沒有了辦法，中國還能有辦法嗎？這樣，「應戰」便成了被動的本能的反應，這是殖民地外交的悲哀。一直應戰到現在，蔣介石還在那裏天天盼望由英國出面作國際調停。近衛聲明發表，蔣介石看看英國的臉色，終於不敢響應，這種是十足的沒出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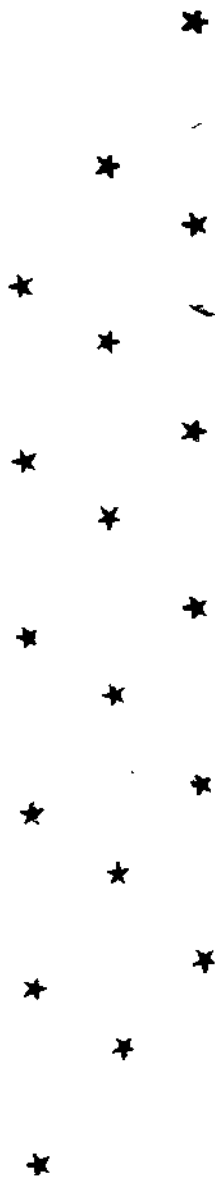
現在的事情已經明明白白，英國雖然還能支配蔣介石政府，但是已經沒有能力解決遠東問題，日本去找英國談判是無用的。中日這一場打，打破了遠東的舊均勢，但是並沒有形成遠東的新均勢。遠東新均勢的形成尚有待於下列兩個條件中之任何一個的出現；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來，或者是中日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來之前，僅僅經過這場戰爭，日本勝利得沒有徹底，英國退却得沒有徹底，美國在乘機推進，但也推進得沒有徹底。經過這場中日戰爭，英美日三國仍然是誰都不能建立她在太平洋上的領導權威，這個權威一天沒有建立，新均勢便一天缺乏核心而無從形成。所以，不但日本單獨去找英

國談判是沒有用，即使日本願意有英美平行調停，問題也還是不能解決。遠東的這種形勢，即英美日三國誰都不能領導誰，誰都不能支配誰的形勢，將一直繼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來為止。但日本是願意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解決中日問題嗎？不，日本不能這樣等待。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在遠東產生的新均勢，與其說是將由日本取得領導地位，毋寧說是將由美國取得領導地位。那麼，日本現在所能走的便只有第二條路，即目前就來中日合作。中國雖然是弱國。但她却是太平洋霸權的一個支點，一個最有力的助手；誰能取得中國的合作，誰便有所憑藉；誰如果與中國為敵，誰便是為叢驅雀，把中國趕到另一個帝國主義者的懷抱裏去。過去中國忽而親美，忽而親英，但是終不親日，只有忽而是美國挾中國以與英日競爭，例如那次華盛頓會議，忽而是英國挾中國以與美日競爭，例如那次通過法幣政策而表現的貨幣戰，但終不見日本有過一次能夠挾中國以與英美競爭。這實在是日本外交的最大失敗。但要與中國合作也不是一樁簡單的事，英國是利用她原來在華的特權，這種特權是因年代久了，在中國人恍惚已經不大感覺得刺激，倒反成了中英接近的環節。美國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她可以不必假手於特權，更不必假手於原始的軍事劫掠而僅須門戶開放，就能結成中美合作關係。然而日本，却以為中日間要建立的關係，只有訴之於不斷要求新的特權，不斷作原始的

軍事劫掠，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兩年來的戰爭已把這一條路走完，碰到盡頭了。高級的侵略方法是投資，低級的侵略方法是特權的劫掠。日本對華作高級的侵略，比不上英美的根底，對華作低級的侵略，在這場中日戰爭中又達不到任務。留下給日本走的只有另一條路，就是根本放棄侵略，以互利的合作取得中國的親善。只有這樣，日本纔能在太平洋上取得領導地位。

其在中國，則應明白過來現行外交政策實在是犯了錯誤。中國的現行外交政策採取的可以說是遠交近攻，與遠處的英國及其他民主陣線國家為友，而與比鄰的日本為敵。與英國及其他民主陣線國家為友自然是可以的，但特以與日本為敵則不可。弱國而採取遠交近攻政策，是自速滅亡。即使是強國，都不能到處都採取遠交近攻政策，戰前德之於奧，現時法之於比，以及美國之於拉丁美洲諸國，就不是採取遠交近攻政策的。又如這次日本想與英國妥協，與之交好，以為分割比鄰的中國，終於因為走不通，迫得改變方針，要與中國親善了。再則，日本也沒有當真依恃其與遠處的德意為友，而對比鄰的蘇聯開戰。何況中國，何況我們的中國是弱國，弱國而採取遠交近攻政策，是自速滅亡。

紀念八一三，是叫我們懂得思索，在蔣介石及中國共產黨聯合對理智狂吠的今日，我們所要做的是批評的工作，糾正的工作。



和平防共與復國救黨

曾芝生

當前的黨國正遭遇着兩大危機：一是共產黨的鑽進黨內，以挑撥離間的手段來破壞國民黨和詆毀三民主義；一是中日失去和平，在戰爭的慘痛裏，國家向破滅的深淵墮落。而這兩者之間是相連的，共產黨的鑽進我們黨內并利用各種狡猾手段，挑撥起中日間的戰爭，並使其無限制地延長，其目的就是在這悲慘鬥爭的過程中，使日本疲憊，中國國家與國民黨覆亡，而共產黨則可或徐或疾地擴張牠的蘇維埃政府——第三國際的附庸組織。

擺在當前的危機是兩個：針對危機挽回厄運的國策，也正是兩個：一是用和平來復國，一是用防共來救黨，而這兩個國策，也是互相關連的，要能復國，黨才有她以後的發展的前途，而要復國，又須把已被破壞與麻醉的黨從共產黨的妖霧與迷陣中拯救出來。

現在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任何一個國民黨的黨員，不能忽視這兩個問題，任何一個愛國的公民，也不能忽視這兩個問題，不僅在理智上要深沈考慮，而且要在行動上實際踐行，黨國纔有挽救於頻危的希望。於此，作者寧寧所欲闡明的，即第一是爲什麼復國需要和平？第二要爲什麼救黨需要防共？

第一復國爲什麼需要和平呢？首先我們就要就國內的經濟政治軍事等客觀條件來考察，其次是要就國際的地位來估量，把這內外的情勢都明瞭之後，復國需要和平可以復國的客觀環境便擺在目前，何去何從，我們朝野的明達與熱誠愛國之士，便不難加以抉擇。

就國內的社會經濟組織與基礎而論，作者在「和平，戰爭與中國經濟」一文裏面，曾嚴重指出中國自身經濟基礎與力量之脆弱與外來經濟助力之不可依賴。鐵一般的實相是這樣：

(一) 中國的工商業落後，都市方面是在外國商品，工業資本，金融資本的充斥與統治之下，農村方面則在原料品與日用外來工業品的不等價交換之下，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破壞，加上超經濟的如攤派，增賦，預徵，徭役以及其他苛雜的強制剝削，大眾已經輾轉於死亡線上。更談不到對於一個長期的國際戰爭可以負擔。

(二) 科學技術不發達，國內資源，不能應得近代工業與科學的技術自行開發並加以製造，仍然要在以原料品與工業品交換的損失形式之下，向外國取得軍需的供給，以從事戰爭。這其間因爲工業與科學技術的落後而蒙受的浪費與消耗之巨，將使國家經濟損壞無餘。

(三) 就整個的經濟基礎說，中國本不能支持一個長期戰爭，而東南沿海一帶經濟力量比較充實以及沿長江內地一帶經濟比較活潑的地區，到現在又都淪陷並轉而作了他人控制內地經濟的樞紐。至就西南與西北而論，不但近代國家的經濟基礎完全沒有，即就舊式的農業與手工業生產技術亦極落後。這種區域只能在和平保障取得之後，急速加以建設。作爲將來中國經濟復興的基礎，而不能在今日資之來作長期的抗戰。

(四) 內部工商業與科學技術落後，民族資本沒有蓄積，產業沒有發達。金融財政方面便只能落到被人左右的地位。戰前與戰事發生以來的法幣，要靠英國的支持。而戰事發生以來的財政，仍要靠英美美的借款。英美之所以願意借款，都之爲了自身利益的打算，如果她的自身利益因爲客觀環境的變化，可以從另一途徑取得保障或須要從另一方面來尋求保障時，那報馬上便看風轉舵了。而且要知無

論如何列強對華的財政援助、根本上並不是企圖使中國將日本打敗，（自然她也並不願意日本把中國滅亡），只是要撐住她自己的利益。所以靠外債打仗，姑假定外債可以源源舉得，勝利有着十分把握的話，然而戰爭勝利結束之時，即就負債一項，在經濟上已足使國家奄奄待斃，何況這些條件都是不可靠的呢。英國前此的財政援助與支持法幣穩定外匯，與現在謀與日妥協和對於法幣外匯價格的支持表示踟躕不前的態度，正是給要把在財政上依賴外力來支持戰爭者的一個當頭棒喝。

這是中國自身經濟基礎不能從事戰爭與外來經濟助力不足以支持戰爭的客觀狀態，惟一的道路是：爭取光榮而有利的和平，在和平保障之下，利用國內餘存的財力，人力，物力並利用外來的資本與工業科學技術以從事建設。要知二十世紀的國家如果沒有近代真實的經濟基礎，是決不足以矗立於世界之上的，而經濟基礎的建立，只能在和平之下進行。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尤有賴於此。這是中國經濟上必須用和平來復興國家的客觀需要。

其次是政治軍事方面。本來政治軍事的建設，在一個半殖民地或次殖民的國家中，牠的目的全在於維繫和平。使國家得到安定，以便從事社會經濟的建設工作。在未建設之前，牠需要與國之間的和平諒解，以保障牠的建設，既建設之後，仍需要保持和平與諒解，以求健全發展和共樹睦誼。中國的政治軍事建設，在戰前沒有取得這種保障，戰事發生之後，復因建設與組織訓練之不足，表現出陳腐，鬆弛軟弱，呆滯，零亂，隔離等等缺陷，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些枝枝節節的技術與組織缺陷我們姑置不論。現在要就戰前以來中國內部政治軍事的重大矛盾和缺點，略加敘述。使知爾後政治軍事的復興，必須有賴於和平建設。

政治軍事的一個總的缺點。便是沒有建設到統一的政治軍事組織，戰前中央只是一個比較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此外則是割據式的一

個個的政治軍事單位。四川是一個，廣西是一個，山西是一個，山東也是一個。甚至每一個人都可以代表一個，而這些分割的政治軍事單位與中央之間，又存在許多矛盾衝突。結果是中央想利用對外抗戰來統一內部並消滅內部的離心勢力，而地方性的政治軍事力量則想藉外力來消滅蔣政權以乘機代起，或保存勢力，加上共產黨別有企圖的鼓動，人民陣線派的無識狂吠。中日戰爭遂在欲戰欲和的狀態之下發展到不能戰不能和的泥淖之中了。本來兩國間的戰爭，是何等嚴重的事態，今竟在這種內部的矛盾衝突之下，使其發生，延長而致不可收拾。使數十年發展出來的一點建國力量消失，這真是不能不使有識之士痛心疾首！

復次是政治組織政治道德的沒有健全，以及軍事組織與戰鬥技術工具之未能近代化。譬如就政治的組織與道德來說吧！因人而設的拚搏枝子機關之難出，中央與地方機關之不能有嚴密的直屬系統，鄉村基層組織之毫無基礎。以及貪污營利，重個人而忽公益之風的盛行。充分表現出缺乏近代國家的政治條件。至於軍事方面，軍士沒有近代戰爭的技術訓練，因為工業與科學的落後，又沒有近代機械的化學的武器，只憑血肉來拚，然而血肉究竟敵不過堅強的砲火。驅千百萬人於砲灰之下，猶只見失地，退守，轉移陣地，改變防線，正說明農業國與工業國間的戰爭，實是一幕慘劇。

或者有人以為戰前政治軍事的缺陷在這次戰爭中統已暴露無遺，自然在戰爭進行的過程中正好加以洗刷和建設。「改良政治機構」，「革新軍事組織」的聲調，不是在戰爭初起時就高唱入雲了嗎？但事實上，政治與軍事的根本改革並不是單純的事件。牠與經濟財力量的發展相依，與工業科學技術的進步相繫，這種建設事業之於一個次殖民的國家，在和平可以保持的時期尚為極端艱難的工作，一旦要在失去了和平國家經濟隨戰爭而破壞的時候來圖謀這種建設，直等緣木求魚！

然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當前唯一的要圖，就是在獲致「光榮右利的和平」，在和平的大纛之下，需要老成謀國的政治家與熱誠愛國的軍事首領的勇敢結合。參加這次高瞻遠矚而富於建設性的和平運動，要這樣，纔能奠定將來政治軍事根本改革的初基。總能使國家從破壞毀滅的泥淖裏拯救出來！復國只是一個抽象的目的，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有切實保障建設的方略。而中國次殖民地地位的客觀需要，只有經由和平才能取得切實的保障。

更進就中國的國際的處境來分析，也只有自力覓致和平的一條出路，至多是利用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來獲得和平而已，與中國在地理上經濟上有密切關係而且可以多少希冀得到一些助力的國家，是英法與蘇聯諸國。但各國之間，均有其自主的國策及其運用國策的各自不同的環境。法國的力量只能附隨英國，而英美對中國的幫助，是純粹基於遠東的自身利益出發的。他們的幫助中國或與日本妥協，概以能否保持他們在遠東的商業經濟利益為轉移，在他們的一進一退之間，中國自身所蒙受的損失，他們是並不關切的。而且他們所能幫助的限度，決不致能使中國將日本擊至崩潰。所以結果除了兩敗俱傷或中國完全顛覆了無結束之外，仍不免要來一個和平的解決。至於蘇聯，無論在東西兩方，都是在極力尋求牠自身的和平保障的。只有慣於欺騙的共產黨與淺識的人們，才希望她在遠東方面出來拔刀相助。但事實勝於雄辯：張高峯事變起了，接着就是和平，庫頁島的爭端起了，接着就是妥協，滿蒙的戰事起了，但我們可以決定這一次的星星之火是不會燎原而將至於息滅的。至於她所揚言對華的援助，甚至於實際的援助，正是維持自身和平的正確國策。中日的長期戰爭，無論中國滅亡日本疲憊，都於蘇聯的和平建設有利。中國滅亡，共黨容或滋長，於她是有利的；日本疲憊，無力進攻或威脅蘇聯，於她本身的和平也是有利的。所以她現在正是要以中國人民的血肉來換取她自身的和平。這就蘇聯的國家利益而言，是正確的國策，我們毫不加以

非難。但我們反過來就我們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地位來估量時，我們不寒而慄。我們要大聲疾呼，我們要痛定思痛，我們要指出長期的戰爭，是國家民族的自殺被殺的迷陣，只有乘機尋求和平，用和平來保障復國，國家民族才有生路，這是前述內部經濟，政治軍事條件與剛才所描述的一個次殖民地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的必需所要求出來第一個正確國策。

第二是為什麼救黨需要防共而防共救黨成為第二國策呢？

近代的國家已經超越了中古專制主義的時代發展到了政黨政治的階段，雖或多黨一黨之分，但無無黨主政之國。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惟一的政黨，她是中國近百數十年來的歷史，社會，經濟，政治諸條件加上國際政治經濟的影響所產生的政黨，復國主政，成為歷史所給予他的決定的任務。但現在我們的黨，因為一時迷惑於共產黨陷入於紛亂的狀態了。由於共產黨的鼓惑，黨失了和平建國的正確的路線，使國家陷入戰爭，使十餘年黨的建設事業輕輕毀棄於炮火之中。這是黨的重大錯誤。但有黨的三民主義在，有黨的賢明領袖與真正了解黨的路線與主義的黨員在，這種錯誤是不難糾正過來。我們現在要用和平來復國，更要以防共來救黨。

我們要防共救黨，我們需要先看共產黨怎樣迷惑並離開我們的黨員，分散黨的勢力；怎樣曲解黨的主義，減低國民對三民主義的信心。這樣，可使已迷惑的國民黨員及早醒覺，未迷惑的國民黨員，不致繼續受毒，黨纔可以得救。

誰也知道，共產黨是十年來流竄各地的毒蛇。自清黨以後，牠自窮蹙南方到逃竄陝北，自提倡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到劫持蔣先生虛偽地服從三民主義挑起中日戰爭，這過程中，牠破壞了無數的農村，殘陷了百千萬的農民，障礙並毀壞了建國的大業，使民族國家的元氣生機，斷喪殆盡，本來共產黨是他們明知抗日要失敗的，但必須堅持抗日到底。為什麼呢？因為就他們的觀點而論，民族國家是

不要的。族民國家滅亡了，國民黨的主力潰敗了，而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勢力，藉抗日復國民族解放等美名，反可順利地發展。他們又何樂而不棄而抗戰堅持抗戰呢？他們套取了列寧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均衡律共產主義可以在某一國首先勝利的理論，認為在中國內部某一區域內共產主義有首先勝利的可能。列寧仍然以國以民族為前提，而中國共產黨的謬論，竟欲在一國內部瓜分豆剖的作起，這樣一來，她們又何愛乎國家民族呢？又何惜乎國家民族元氣的損傷呢？所以丟開救黨不談，純就復國與復興民族的立場上來講，決非防共不可。

至於對國民黨與三民主義的挑撥與污蔑，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大體的方式我們可以歸納成下列的兩項來說：

第一對於三民主義，他們常冠之以「革命的三民主義」，「革命的民生主義」，或「革命的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等名稱。共產黨並宣稱他們是服膺革命的三民主義。這種名稱，淺見者以為他是對於三民主義的羨美，實際有識和真正了解中國國家民族地位與三民主義的人，誰也可以識破他們的詭計。因為三民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中國近百年來歷史和現實的社會國家的客觀條件所要求出來的。針對這種現實的客觀要求而產生的三民主義，是和平建設的救國良藥。無所謂革命的與不革命之分，共產黨在國內失敗，窮途末路之後不得不虛偽的表示服從三民主義。但實際地棄毀三民主義的全體，不時斷章取義的竊取三民主義的一詞一句，冠之以革命的美詞，以掩飾他們的荒謬宣傳。蒙亂我們黨的主義的真相。

第二對於國民黨，上則劫持着蔣，使其無地轉圜而只能一味地抗戰下去，下則把國民黨的黨員，無中生有的渲染出許多醜聞。使他們互相離異。如在共產黨及其外層的附和份子所謂人民陣線派者流的報章雜誌之上。便可看到「革命的國民黨員」、「反革命的國民黨員」、「前進的國民黨員」與「腐敗的國民黨員」等挑撥詞句；在和戰的問題上，又將國民黨分成主和派與主戰派的營壘，在思想上，又強分出

「民族的失敗主義」、「民族的勝利主義」、「漢奸理論」、「進漢奸理論」等污蔑的名稱，俱如此類，不一而足，這都是共產黨破壞國民黨拆散國民黨的團結的真實真相！

我們現在站在救黨復國的立場，我們要嚴格的防共，要把共產黨從黨國的內部肅清出去而加以根絕，我們的主張是：

(一) 在和平的大震之下，國民黨員重新精誠團結，從共黨的迷惑中，自救救黨並進而復國。

(二) 恪守三民主義，根據次殖民地國家民族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及其所處的國際地位，發展並鞏固黨的理论。以正確的理论武器肅清共黨的荒謬宣傳，使其無從假借。

(三) 重新鞏固黨的組織，確定黨的任务與路線，以黨的堅強行動與力量，肅清共黨的流毒。

現在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擺在我們當前的危機是兩個：國的覆敗與黨的破亡；挽救危機的國策也是兩個：和平復國與防共救黨。時機迫切，何去何從，決不容我們的狐疑猶豫。認識的憂國之士與真實勇敢的國民黨員，早與乎來！

共產黨所唱的統一與經濟封鎖

——美聯社記者馬田的通訊——

(延安) 特區政府為便利買賣起見，曾發行鈔票代替各種國幣和省幣，甚至銅板亦以鈔票代替。這種鈔票，除了特區政府的信用以外，毫無現金做準備。但特區中人都得照值使用。國幣的需要並不大，而特區的貨幣，在特區以外各地亦不通行。

奢侈品的價格，因日貨從冀察熱魯各地輸入，並不昂貴。

和平，戰爭，與中國經濟

芝生

恢復和平與繼續抗戰到底有着怎樣的利弊，這不是意氣和感情所能判斷的。近代的戰爭，尤其是國際間進行的大規模戰事，勝負之數，常不能決之於敵愾心之強盛，而決之於國與國之間經濟力量強弱的差異。中日戰爭，自開始至今已歷兩年多了。姑無論認為「最後勝利，終歸於我」或「失敗必屬於我」這一類信念之依據如何；我們應該就中國本身經濟的結構與實質來分析一下，究竟和平有利；還是繼續抗戰為得計呢？

就中日一般的經濟基礎而論，日本是工商業發達了的國家，科學技術有高度的水準，跟着是國家組織的嚴密。科學技術應用到戰爭方面所特有的現象，是軍需工業發達，戰鬥工具堅強，軍事組織與交通運輸便利；反觀中國，始終還停滯在農業生產而沒有工業化的半殖民地經濟階段，工業落後，科學技術不發達，國家組織鬆弛，表現到國防方面的，是軍需工業沒有基礎，近代戰爭的新式武器只能靠國外的供給，而且因為缺乏科學技術的訓練，即令取得了此項供給，亦有難於運用之處；在這樣形勢之下，勝負之數，本不待著龜。這一點，早已為有識之士所見及，茲不贅述，茲專就中國經濟的實質而論，而不宜繼續戰爭的事實加以闡明，藉供舉國人士的參考。

第一如前所說，中國是停滯在農業經濟的半殖民地國家，在國外商品輸入與國內原料品輸出的不等價交換的損失之下，以及外國直接輸入工業資本的剝削（如在內地投資設立工廠）與平輸人金融資本控害民族資本發達的狀況之下，中國固有的社會經濟基礎破壞，新的近代工商業社會經濟基礎難於建立，在這種環境之中，最正確的經濟

策略，是要利用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與資本，使國家工業化，逃脫不等價交換的損失與外國工業直接的剝削，從而漸次使民族資本發達以擺脫外國金融資本的控制，要這樣，纔能挽回這半殖民地國家的命運。這是一個偉大的事業，但這一事業，需要國內的休養生息，需要國際間的和平。沒有和平的保障，即令見已經工商化了的國家都要破產，更何望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能成功這樣的偉業！所以必須在政府治上外交上努力取得這種保障，未失時本該極力保持，既失時應則極力恢復，否則不但不能挽救半殖民地的命運，反而有使中國淪入完全殖民地之危機！

第二是農村經濟的破產，不能任戰爭延長，使其由破產而致滅亡，使一班農民由流離顛沛而填死溝壑。中國的都市經濟，是外國商品，工業資本，金融資本的附屬物，他是沒有自主性的。通過資本主義國家自設的洋行與其卵育下的買辦行幫，工業商品價格時在提高，農業原料品的價格常被抑低，中國因為未能工業化，對外貿易主要是農業原料品與工業製品的交換，其間價格差額頗大。這種差額的損失，多是農村中的農民蒙受。這是農村破產的外來原因，其次是多年來的內亂，水利不修，兵災迭見，超經濟的強制剝削（如徵田賦雜捐之類）使農村經濟崩潰，農民幾於無法生存。中國的都市經濟既不能支持長期戰爭，貧困的農村經濟，事實上更難作長期抗戰的基礎。而且與先進的工業國家作戰，要靠動員落後的農村的物力財力來支持，姑無論是否有此力量，即在散漫遲行不易結集的這些客觀存在的困難之下，誰也不能不發生懷疑。所以為着使農村尚有復興機

運，運用外交，乖機覓取有利的和平，以保障將來的建設，正是客觀的經濟條件所迫切期待的事業。

第三是依據西南與西北的經濟基礎，亦不能從事長期抗戰，現在的當局，常以建設西南西北作抗日復興的基礎相號召，實際上中國一般經濟落後，而西南與西北區域則較東南與沿海一帶尤遜。事實上應該寬致和平，努力建設，以爲後圖，但却難據以作即此抗戰下去的經濟基礎。譬如廣西貴州各地，遑論工商業的落後，僅有極粗劣的家庭手工業，農家副業式的手工業與小型的工廠手工業，新式工業不見商業則帶原始性的市集或墟市尚極普遍，即舊式的農耕技術，亦尙未發達，貴州西部北部南部，廣西北部西部，尙多木犁火耨，荒地遼闊，耕地稀少，至於西北狀況，較西南尤遜，這種地域的建設，在承平時，尙爲極艱巨的工作，今欲一面抗戰一面建設，而反過來馬上欲拿作長期抗戰的根據，事實上決辦不到。客觀條件的限制，需要努力取得和平，并於和平取得之後加緊建設，以作爲將來新中國更生的經濟根據地，這才具有希望。

所以一般的中國經濟基礎或專就西南經濟的現況而論，和平的恢復，有着極重大的價值。讀者至此，必定要懷疑，中國經濟的本質既如此微弱，爲什麼戰事發生以來，中國可以抗持到兩年以上呢？這一點，我們要就列強國際間經濟關係的鬥爭與衝突來解答。

如前所說：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是工商業落後的農業經濟地域。他是列強的商品市場原料市場，在這裏，列強間各種鬥爭的實相都顯現出來：工商業經營特權競相攫取，原料與商品市場範圍的互相排斥，金融貨幣權的彼此爭奪……，跟着是國際政治外交的鉤心鬥角，甚至有時還各自以武力爲後盾以相炫耀。所以當法幣制度完成，中國幣制聯繫到英磅集團的時候，日本的砲聲也跟着響起來了。經濟的鬥爭失敗以武力來硬幹，正與經濟的鬥爭成功反對以武力來侵襲，動機是一樣的。即是都爲着他們本身的經濟利益。日本猛烈地以武力

來侵略中國與英美等的願意以財政來支持中國的抗戰，其出發點都是如此。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衝突，中國暫時取得了財政上的外援，更由此而獲得了外國軍需的供給，這樣中國的抗戰支持了兩年以上。雖然抗戰的能够支持還有近年來民族意識發達與國內統一加強的種種因素，但這種外來的經濟助力，是不可否認的決定成分。

兩年以來，既然靠着外來的經濟助力支持了抗戰，以後是否可以繼續依賴外力而且繼續抗了下去呢？如果外來的財政支援可以源源不斷，軍需供給如水之有源而不枯竭的話，自然是可以的。但無如事實上決不會有這樣的甜頭。比如就英國而論，爲了怕日本獨霸東亞侵害其在遠東的經濟利益起見，可以財政援助，支持中國抗戰，如以前的貸款，支持法幣，穩定外匯，便是實證，但是同樣的爲着維護他在遠東的利益起見，看到維持法幣與穩定外匯將是一個無底的損失的深淵的時候，倫敦方面便又要退縮起來了。貸款的遲遲不付，繼續支持法幣的躊躇不決與乎這次英日東京會議的對日妥協，也便是實證。所以任何國外的經濟援助與否，只是爲了牠自身的利益。我們可以依據中國本身的經濟條件來打算盤并利用這種外來的經濟助力以取得有利的條件。但如拋棄客觀存在的本身經濟條件不計而專憑外力以爲轉移，則在外來助力的一進一退之間，中國所蒙受的損失，將至不可言說。

戰爭是決非兒戲的事，牠可使強國變弱，弱國變亡，戰爭是破壞的惡神，歷史上沒有從事戰爭的國家不陷入府庫空虛，民生凋蔽的。戰勝國可以從戰敗國身上榨取以爲補償，猶往往所得不如所失，因而疲憊不振。戰敗國所受損失之嚴重，則更不待言，數十年來建設之不足，一旦戰事摧毀之有餘，這是不可不慎重的。

抑尤有進者，中國的經濟及基於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力，固不足以言支持長期戰爭，但經濟薄弱國力不充的國家欲尋求和平的保障，亦決非易事。「戰」與「和」在中國客觀存在的經濟社會政治條件之下，都成爲一種艱鉅的事業，「戰」與「和」的是非，不存在於「和」

「戰」的本身，需要戰或需要和，可以戰或可以和平，均須就客觀的經濟社會政治條件能容許與否來作決定。然而在中國，我敢說，和平的獲得有莫大的價值。取得光榮的和平以保障將來的建設，應為一班有識之士所共同邁進的事業。

然則如何纔可以取得光榮的和平？在什麼條件可以從事和平的奠定呢？

前者我們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說，第一是要促起日本朝野的注意，使他們歷次所宣稱的「中日共存共榮」的主張，要真實的在經濟的實質上符合於「平等互惠」的原則。經濟上平等互惠的合作，可使中日兩家其利，而有利於東亞的永久和平。反之日本如果以戰勝者自居，從速以政治的軍事的手段，壟斷資源，獨霸工商業市場以及各種交通運輸事業，使中國喪其經濟生存的命脈。則和平是不可能的。而且後患之來，不堪設想。日本雖然可在軍事上一時對加以控制，但無窮盡的中日間之紛擾，中國固因此衰亡，日本在經濟上亦非患貧血症以至於竭蹶不可。這是要促起日本朝野明達士人的嚴重注意而加以真誠的諒解的。其次是要提醒國內有識和愛國之士，使知中日間長期的爭鬥，只是兩敗俱傷，日本的經濟基礎固不及英法，但究比中國為強。中國的長期抗戰，姑假定其為可能而且可以促起日本經濟的崩潰。然日本崩潰之時，中國早已枯竭無餘了，所以最好是取得日本的諒解。在科學技術上借助日本，在經濟上彼此平等互惠，由經濟上的平等互惠，消除政治軍事甚至外交上的紛爭。這樣，真實的和平才能有

望。

關於後者——究竟在什麼條件之下可以奠定和平呢？——大凡結束戰爭奠定和平，除了兩個國家打到一榻糊塗作不結束而結束之外，一般總是有政治軍事經濟上的條款的。現在姑勿論近衛的聲明是否可作和平談判的基礎，或由這一基礎談判出來的條款是不為亡國的條款以及日本是否真實履行諾言這一類問題的實際性如何，我以為一個大的原

則，是任何條款，均須在使中國經濟，將來能夠發展而日本也可得利益的前提下簽訂。不然的話，則在中國方面，一班人均將認為與其慢性的貧血而亡，不如痛快的抗戰而死。和平是決難獲得善果的。至於政治軍事條款的簽訂，也須在上述的前提下而且為保證上述的前提下進行。因為經濟政治軍事是互相繫聯着的，如果政治軍事的條款，使中國喪失了領土完整與國家主權的時候，則他沒有法子保證經濟方面將來可以發展，則一般均將認為不如繼續抗戰，和平的也是決無善果的。

所以時至今日，真正平等互惠與真正共存共榮的和平，就中國經濟甚至於就日本經濟都是一件迫切需要的事業，這事業真正的完成，並不比兩國間進行戰爭事能為極容易，牠須要兩國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兩國工商實業家的推誠相與，兩國軍人間的化除仇恨，以及兩國民眾的純真親善。沒有互相開誠心誠意的諒解，沒有坦白勇敢公平合作的決心，則一時則休戰言和，或可由強制而致，但真正永久的有利兩國的和平，則決無倖致之理。

重慶政府今年的預算總額

財政當局頃對美聯社記者稱：本年度財政（是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預算總額為二十八萬萬五千萬。查中日戰前之預算，在一九三六年為十二萬萬元，一九三七年為廿一萬萬元，一九三八年為廿四萬萬元。

戰爭中的中日與國際

余志遠

中日兩國正在作戰，交戰國的任何一方，都希望幫助自己的友國越多越好，幫助敵人的國家越少越好。一般與戰爭有關係的國家，對交戰國的態度不外三種：一是助我，一是助敵，一是中立。假使助我的國家多了，我可以聯合自己的友邦羣起而攻敵，定可一鼓而屈服敵人，得到勝利。反之，助敵的國家多了，協以謀我，也勢難避免為敵人征服。不助我也不助敵人的中立，對於交戰中的強國有利。

中日戰爭中，中國是弱國，是被侵略者，日本與我恰相反。因之，中國有獲得各國助我攻敵的可能，同時也正是中國朝野努力實現的希望。這一點可能，日本也沒具有，它的最大的希望是各國中立，減少助華的力量。所以在戰爭中的中日與國際，中國是個順勢，日本是個逆勢，中國作好了，可以增加助我敵日的力量，日本作好了，也不過減少助我的力量而已。順逆之勢雖有不同，要是中國想實現各國助我攻日的願望，日本想一網打盡中國的友邦均不可能。中國在有可能而不能實現的希望上，寄託它的最好勝利，日本便趁着中國得不到切實援助的空隙傾力進攻，中國只有敗退。終因日本是個強國，在中日對打中，日本佔了些暫時的勝利，兩國對於轉變國際有利於我的局面，仍是努力不懈，各向有利於己的方向邁進。

國際援助，是中國想望的最後勝利到來的一種可能。中國對與遠東有密切關係的大國，如美，如英，如蘇聯，都依照情勢有不同的希望，希望獲得他們不同的助力。中國對於英美蘇的主要希望，大概可以歸納為下述的三句話：政治聯美，經濟聯英，軍事聯蘇。

美國在遠東的現實利益不像英國那麼大，潛在的利益較之任何國家為高。美國又不比英國岌岌於維持歐洲均勢，因之在遠東有比較優

越而自由的政治地位，假使對遠東的國際事件肯作登高一呼，確可領導各國有所行動。譬如二十年前的華盛頓會議是美國發動的，由於英美合作，會議中產生出維持中國行政主權完整與獨立的四大原則。一九三一年東北事變，美國仗義執言，英國不肯合作，美國助華抑日的政策，以不承認主義而敬場。現在形勢變異，英國渴望美國在遠東有領導的行動。中國政治聯美的希望也立足於此點。不過由於美國的實力及孤立主義派的活躍，在遠東不能有劍及履及的行動，羅斯福總統的幾篇震動世界的演說，不外是維持顏面的大言，至今尚無實際行動，未來也不會有實際行動。中國政治聯美的打算，終是一樁可望而不可即的水月，可能而不可實現的希望。

至於經濟聯英，自中國實行法幣以來已是一種事實。抗戰發生後，中國也獲得英國不少的幫助，英國利用這種幫助，鼓勵中國抵抗日本，以阻礙日本獨霸遠東，同時也利用這些幫助，羈絆住中國不至於依附蘇俄。幫助的限度只是到上述的界限為止，中國得之，誠如杯水車薪，不足以獲得最後勝利。儘管英國今天給中國數十萬鎊的信用借款，明天給中國數百萬鎊的平準基金，既不足應付中國的需要，甚至附着於英鎊集團中國法幣，也日趨跌落。即令如此，中國對英國仍存有很大的希望，所謂經濟聯英便從此產生。我們看中國從事戰爭已到二年前對垂亡的捷克，借與大批款項，動輒數千萬鎊，對中國的大批借款在那裏，僅有百數十萬的信用借款，還是我們的拿貨物換來的，假使歐洲局面再緊張，老牌的資本主義的英國，雖擁有大量黃金，也將自顧不暇，它還能顧到我？英國究是個先進的國家，它雖不能借給中國

大批款項，却不使中國失望，時時借給中國點滴的款項，使中國不至於無力抗戰。可憐的中國將長期抗戰寄託在這渺渺的希望上，英國却利用中國繼續戰爭的局勢，向日本大開其妥協談判。所以英日的妥協總在時斷時續中，中國的抗戰被漂渺的希望帶到無底的深淵了。

軍事聯俄，更不是根據事實決定的國策，而是部分的輿論製造出來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外圍份子，是靠虛布為生的。如果中蘇邦交好轉，共產黨人看來，是中國政府與自己的主人交好、俗言說的好，「打狗看主人」，中蘇既然交好，中國政府看蘇聯的面子，自未便再繼續「剿共」。而且任何戰爭都足以製造社會的紛亂，共產黨可以利用紛亂的局面，擴展自己派系的勢力，便時時鼓吹抗日戰爭。七七事變前，共產黨人宣傳中日如果開戰，蘇聯一定可以幫助中國，八一三戰事發生後，中蘇定立互不侵犯條約，給了大家一個衝動，都認為是中蘇訂定軍事同盟的先聲，一時蘇聯出兵的宣传甚為濃厚上，就連軍事當局也相信三個月後蘇聯必定出兵了。及至南京陷落，中國已單獨打了五個月，未見蘇俄一兵一卒，大家由熱望蘇聯，變成失望，共產黨徒的欺騙宣傳也給鐵般的事實戳穿了。中日戰爭再延長下去，張高峯事件發生，大家又受了一次震動，以為日蘇要將打，及至張高峯事件以劃界終了，日蘇之間和平無事，使日本得移住東北之師前攻廣州，算是蘇聯助了日本一臂之力。中日戰爭兩年了，那是中國獲得蘇聯的實力協助？即是一些飛機及軍用品，還是我們用農產物及礦物換來的，與中國及其他國間物物交換的貿易沒有什麼分別。蘇聯出兵只是一種宣傳，蘇聯利用宣傳延長中日戰爭，中日俱在消耗實力，蘇聯在對比上力量增大了。中國的「軍事聯蘇」是真的希望，蘇聯出兵是欺騙的宣傳，久而久之希望只有失望；宣傳也要歸於無用了。

上述的「軍事聯蘇」，「政治聯美」，「經濟聯英」的希望，如果實現，以中蘇英美的大聯合，羣起而攻日本，日本是不堪一擊的。至時無疑的最後勝利便屬於我。可惜這些希望均是可望不可即的，沒有實現的可能，尤其沒有全般對現的可能。政府當局拿這些話以鼓舞人心，湊勸士氣則可，一般人真的寄託最後勝利於這些希望之上，那只有失地喪師，自己吃虧了。二年來的慘痛教訓，希望已在大部份人的腦海中幻滅，可是朝野上下誰也沒有絕望。這與人窮則呼天是同一道理，一般愚民到無可如何時，下問休咎，實可乞靈於木偶，這是絕望中的一點寄託。中日戰爭何嘗不是如此，日本如果進逼不已，

大家不能坐以待斃，只有挺而走險，任何無望的事都是一點希望，不暇思索自己所希望是妄想抑是事實了。

中國對於英美蘇的希望已如上述，日本對於他們也是希望幫助自己，至少不助中國。英美蘇協助中國有可能而不會實現，英美蘇協助日本的可能也沒有，這是國際環境對中國比對日本有利的情勢。日本既得不到英美蘇的積極幫助，要做到獲得消極的協助，即是在中日戰爭中保持中立。日本要求英美蘇中立的辦法各有不同，它獻媚美國，打擊英國，監視蘇聯。

日本在戰爭中，損害各國在華的權利不一而足，對於美國却特別客氣，任何一次答復美國的抗議，總是低聲下氣，巴拿馬炮艦一案，美國擺出強硬的面孔，日本也極盡卑躬屈節之能事。在中國各地只要有美國牽連在內，日本總是竭力避免衝突，避免干與，這種事例到處可見。日本想以柔順的方法爭取美國的歡心，換取美國的中立。日本對於英國便不如此了，處處恫嚇英國，強逼英國讓步。英意結合，本是以反英為主要目標，日本又時時申斥英國幫助中國，損害英國在中國權利。例如英國駐華大使為日本鎗擊，日本對於英國沒有像對美國一半禮貌，使人頓生英國人不如美國物的感覺，至於最近的天津事件，各地反英的活動，加給大英帝國的侮辱達到極點了。英國只有忍受而開始東京談判，被這着承認遠東的既成事實，嚴守中立，日英外交走到這一階段，日本打擊英國讓步的計劃大部分成功了。日本對於蘇聯則用監視的方法，使蘇聯不敢有所行動，日德聯合便是監視蘇聯的具體表現。蘇聯儘管自吹紅軍的威力如何強大，究沒有西抗德國東拒日本的力量。蘇聯處在德日的夾攻中，自顧不暇，那有餘力參與中日戰爭，二年來蘇聯對中國不能有進一步的協助，原因正在於此。自稱革命的蘇聯尚嚴守中立，中國抗戰的力量又弱一環，日本的打算又成功一步。

日本對英美蘇各用不同的方法，都漸漸獲得中立的效果，是日本外交成功，反之，便是中國的外交失敗，希望幻滅。國際援助本是支持中國長期抗戰，獲得最後勝利的槓杆之一。現在這一個槓杆日趨損壞，我們還能靠自己的力量久戰下去嗎？

英蘇談判之經過與展望

吳無吾

英蘇談判的成就，並不在於軍事或政治協定的締結，而在於談判本身的延緩。談判時間愈加延長，甚至變成長期的，或永久的，則英蘇談判的作用也就完成了。協定云云，反倒成爲無用的東西。

英首相張伯倫曾於六月八日宣布他的政策是「進行兩種不同而不抵觸之方針，即一方面設法消弭戰爭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建立英國之實力，俾於討論解決條件之時，不致有任何國乘其荏弱，迫令接受不光榮或有害於英國重大利益之條件」。因此，去年九月的慕尼黑會議，與今年之保證波蘭，羅馬尼亞，以及正在舉行的英蘇談判，都是同一政策的兩面，即消弭戰爭可能的原因，而並不表示着前者是屈服，後者是組織反侵略陣線來準備打仗，總之，目的都在於戰爭爆發前，使英國有充份時間，充實實力。

路易喬治說得好，「我們外交的目的，在爭取時間而不損及實力。」

至於蘇聯的政策，則是史太林的誓句，曾被無數的蘇聯政治家覆述過的「絕不替別人從火中取栗子」的純粹楊朱主義。他無愛於資本主義民主國，更無恨於另一路線的同志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更因爲英法這次主動的成份較多一些，所以更使史太林有提高身份，漫天要價，唱高調，撒播撒癡的機會。集體安全制度云云，不是他的政策，只是他的口頭禪。

因此，英蘇談判，自始便在互不相信，互思利用的情形下進行着。一種要求，剛剛經過許多磋商得到滿足，又有另一新要求，四個月以來，幾乎幾種原則還沒有得到。不過，在另一方面，張伯倫又勝利了，四月以來他阻止了希特勒的行動，英國的擴軍已然有了相當的成

續。

本來，英蘇談判的起源，是由於希特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吞併了捷克。張伯倫以極大的忍耐心換得的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對歐洲再無領土要求」諾言，成爲廢紙。歐洲一般局勢，岌岌可危。波蘭首先感到危險，羅馬尼亞也由與德經濟談判，而感到一種壓力。在英國國內，攻擊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的言論，提議改組內閣的呼聲，叫囂塵上。於是張伯倫在三月三十一日以單方的諾言，答應保障波蘭的獨立。

波蘭，在地理位置上，介於德蘇之間，如果沒有蘇聯參加，則英法是難於保障他的獨立的。因此，路易喬治曾批評張伯倫未得蘇聯同意而貿然允諾保證波蘭的獨立是不智的行動。英國國內，都紛紛的要求與蘇聯合作。

在四月七日，意大利突然的吞併了阿爾巴尼亞。希臘半島與東地中海的局面，又趨於緊張。於是英國又於十三日單方聲明保證希臘，與羅馬尼亞的獨立。

由於波蘭與羅馬尼亞的地位，使張伯倫感到爲要使他諾言，不至於毫無重量，必須要求蘇聯合作，爲要平抑國內的感情，必須與蘇聯談判。爲要使法國再靜一下，也必須與蘇聯談判。

因此，英蘇談判便開始了。

大概英蘇談判內容的前後變化，可以分作三階段，第一期，是英國希望蘇聯與英國同樣的單方保障波蘭，羅馬尼亞的獨立，而蘇聯則堅主成立普遍集體安全制度，更進而主張的相互保障制度。終於由

波蘭羅馬尼亞的保障問題，擴而為英法蘇三國互助問題。第二階段是三國同盟問題終結於對於「間接侵略」之界說問題，仍未獲得解決。第三階段是蘇聯提議在政治協定未訂定前，先舉行參謀談話，英國先拒絕，後來終於贊同。於是，政治協定之訂定，反要看軍事談話進行的程度了。大概此後三個月內，將仍是軍事談判時期，政治協定云云，暫將擱置起來。如果軍事談判，仍無結果，則英蘇談判，也或許因其「目的」已然達到，而無需加以進行。

在第一階段中，英國希望蘇聯也給與波蘭羅馬尼亞以保障。這時蘇聯提出集體安全制度，英國因為「不能不顧及其他國家的願望」，而予以拒絕。於是蘇聯便以恐怕自己實行援助波羅兩國，而英法袖手旁觀不肯動作為理由，不肯提供保障。這一點，自然表示對英國，特別是對張伯倫的不信任。英國為打開僵局，再提起蘇聯的援助，只有在英法實行援助波羅兩國以後方始實踐。這時候，被保障的兩國，都表示不願受蘇聯的保障，蘇聯總算是抹了一鼻子灰。英法不得已改作「在英法因援助波羅兩國而與侵略國發生衝突時，蘇聯給予英法以援助」。避免了「援助波羅兩國」的字樣。

在這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有電分致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請其保證三十一國的獨立。於是英法蘇德意的外交都積極的活躍起來。德國方面，向北歐與波羅的海諸國，相繼的發出詢問，是否德國已威脅他們的獨立，並且要求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的演詞，給予羅斯福以極大的不快，他聲明他沒有威脅任何國家的獨立，蘇聯則在黑海沿岸積極活動。他們要研究英土協定，英國與希臘羅馬尼亞的關係，究竟是對德意的，還是對蘇聯的。英國則於英土協定成立以後，又繼之以對土、羅、波予以借款，俾可重整軍備。另一方面迅令駐德大使返任，希望使希特勒勿閉和平之門，一切爭執，儘可照羅斯福所說的在會議中解決。

因為英法只要蘇聯予以援助，而不允予蘇聯以援助，於是蘇聯國內積極反對這種不平等不互惠的形式，終於起了一次變化，唱集體安全制的李特維諾夫下台，莫洛托夫繼任。英國希望在五月中旬國聯開會時，蘇聯可派莫洛托夫出席，或者派外次波丹金順便由波蘭去出席，因此，在國聯會期中英法外長可與蘇聯外長直接商談。但是蘇聯的架子，是擺得很足的，外長與次長都不肯出席。

英國終於答應了如果蘇俄因保障波羅兩國的獨立而受攻擊時，英法即自動予以軍事援助。互惠條件得到了，理應英國談判即可結束，但是蘇聯又出了新花樣，要訂定三國軍事同盟，要英法保障蘇聯東西邊境之安全與西歐邊境諸國的獨立。這樣，英蘇談判，由保證波羅兩國問題，變而為三國同盟問題，談判進入了第二階段。

在第二階段中，英國先要求不要將遠東包括在內，這一點蘇聯總算是表示同意，問題僅局限於歐洲。對於蘇聯提出的徹底防禦計劃。英國不願接受許多自動實施的約束，提出新的對案，在五月中旬送交莫斯科。據報紙上所載的，提案內容，約略如下：

一、互助協定將在英法法三國在歐洲領土遭遇侵略時發生效力，但在正式協定向未成立之前，將由三國聯合宣言，聲明共同應付此種威脅。

二、英法兩國倘因（甲）保證他國而被一個或兩個以上之強國所襲擊，或（乙）歐洲國家請求英法援助，英法加以允許，而致英法兩國捲入歐戰渦漩時，蘇聯將以全力協助英法兩國。反之，蘇聯如因上開兩項情形之一而致捲入歐戰渦漩時，英法兩國，亦將予以同樣之協助。（另一電訊，則謂此條如下：「舉凡受三國保證之任何國家領土遭受直接侵略時，三國應共同會商及決定行動，關於何國應受保證一節，仍待討論決定，同時任何被侵略國家，必須先行抵抗，然後始可享保證之効力」）

(三) 締約國彼此協助之方式，略與國際約章第十六條之原則相仿。

(四) 三國應即舉行磋商，以確定彼此互助之辦法。(另一電訊，則謂此條如下：「三國將召開參謀部會議，以期三國間之海陸空軍獲致最高效率之合作。」)

蘇聯絕不肯在正式協定訂定前，先發表共同宣言免受拘束與被利用。

莫洛托夫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演說，說明蘇聯的觀點，「不必再與任何人商討」。表示只有英國人去俯就他，他是不肯將就別人的。他的觀點，是「堅持三國協定必須具有絕對防禦性，保證蘇聯一切鄰邦，及如遇任何簽字國家遭受攻擊時，成爲一實質的互助協定」。

蘇聯致英法的正式覆文，對於按照國際聯盟約十六條規定行動方式，認爲英法仍然意存延宕，而主張改爲「依照國際聯盟各項原則，並依照各種精神，」不使英法有藉盟約而自行延宕的機會。另外對於英法提案中主張各簽字國應互相諮詢一點，蘇聯認爲「在並無戰爭危機之時，不妨保持諮詢辦法。設遇發生此種危機，則應立即有所行動，並應在事前規定自動方式」。對於援助各簽字國保證之國家一點，蘇聯認爲「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亦應予以保障，並在英法蘇協定中載明各國國名。」

正在這時候，德國與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的互不侵犯協定訂立。於是蘇聯真理解，便將保證波羅的海諸國問題，當作英法蘇同盟的基本條件。不過，波羅的海諸小國，則尚未忘記沙皇統治時代的教訓，與赤俄當權時的危脅，不肯接受蘇聯的保證。這一點，被英人利用了。

英法，對於蘇聯的覆文的答覆，應允互助協定，不與國際聯盟約，發生關聯。對於互相諮詢一節，應允「遇有必要時，英法蘇三國應即交換意見，但各該國仍可立即實行互助，初不因有待交換意見而受何

拘束。」對於波羅的海諸國問題，英國則以三國未請求英法保證不願受保證，英國須尊重其獨立爲理由，而希望協定條文中，不列舉國名，而只籠統的保證蘇聯各鄰邦的獨立。末一點，蘇聯不能滿意，認爲英法意存觀望，於是英蘇談判，又由三國同盟問題，而收縮到波羅的海諸國的保證問題。

局面弄得僵，英國國內，提議遣派大員親到莫斯科去談判。於是張伯倫而下，哈立法克斯，艾登，汪西泰都相繼被人提出，蘇聯也覺得或可增加身份不少。但是，張伯倫反派了一個外部中歐司司長史特朗到莫斯科去，使莫斯科的威望，又感到一點損失。

英國表示可以担保波羅的海諸國，不過蘇聯應於保證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等國以外，也應保證英法邊境上的荷蘭，比利時，瑞士與盧森堡。蘇聯對於後數國的保證問題，輕輕的以與數國「均未保有正常外交關係，保障之議，恐礙照辦」爲理由，拒絕提供保證，同時蘇聯對於互助辦法，還認爲「既於英法蘇三國所保障之任何一國遭受侵略時自動無保留的付諸實施，而被保障各國遭受侵略的危脅時，或內部侵略時，亦當如是」。另外，蘇聯更要求與土耳其波蘭簽訂互助協定。

新的問題，逐漸提出，蘇聯這個饕餮，永不會吃飽。
英法的新對案，大概是：

1, 英法兩國同意將荷蘭瑞士，置於保證範圍以外，但以蘇聯放棄與土波簽訂互助公約爲條件。

2, 英法對於波羅的海各國之保證，其性質分爲兩種，(甲) 波羅的海各國受直接攻擊時，三國自動進行軍事行動。(乙) 倘因波羅的海各國國內事件，使蘇聯感受威脅時，必須三國先行磋商，然後作軍事行動。

條件，對於波羅的海諸國的間接侵略不主張自動實施援助，而主張先行互相諮詢仍未能使蘇聯滿意。蘇聯所說的內部侵略，或間接侵

略，包括着「倚外國以壓力加諸波羅的海各國，使其改變憲法，此亦當視為對波羅的海各國之威脅，英法蘇應立即採取軍事行動，中止此項內部侵略」。

「間接侵略」的界說問題，於是又成了英蘇談判的中心，七月一個整月，對於這一問題與應付辦法，仍沒有成議，

這時候，世界各國的輿論，都漸漸轉變，非難張伯倫的論調，都轉而對蘇聯之得尺進尺，加以不滿了。於是蘇聯便提出在政治協定未訂立前，先舉行參謀會議，英法則認為政治協定未訂立前，不能洩漏軍事秘密，並且想先訂定一種政治協定，而將間接侵略問題留待以後討論。於是英蘇談判中，便產生了程序問題。

談判延緩的原因，在這期間，使英蘇又有一次辯論。英國認為「談判延緩之主要原因，乃在形式上之差異」，「吾人應否侵犯波羅的海各國之獨立」。塔斯社則辯稱「實際差異，不在是否侵犯波羅的海各國獨立問題。據雙方已同意保障此獨立，而在間接侵略之界說中，不應為企圖危害波羅的海各國獨立之侵略者皆有漏洞。英國界說中留有此種漏洞，故為談判延緩的原因之一」。

英法究竟扭不過撒嬌的蘇聯，肯出極大的代價，以博取史太林的領首，於是政治協定之訂立，暫時擱置，先舉行參謀談話，到相當時間再談政治協定。這樣英法談判進入了第三階段。據說軍事談判，至少需要兩月。可見這一談判，將更為延長了。而蘇聯會要求英法派遣軍事代表團，長期駐在蘇聯，可見蘇聯很有把英蘇談判變成永久談判的意思。

英蘇談判，將來能否成功呢？

這要看英法蘇各國的外交政策與目的，以及在談判中各方所要求的權益及應負擔的義務的比重。

對於前者，於各國在談判中所執行的政策以外，還要看同時在歐

洲各國所進行的外交活動，方能明瞭究竟各國將英蘇談判怎樣看待。英國的政策，是設法消弭戰爭的原因，為英國擴軍，留下充分時間，以便將來談判各種條件時，不至被人所乘。這是張伯倫自己所講的政策。英蘇談判，正是他消弭戰爭的手段之一，他雖未必想藉英蘇同盟來壓抑德國永不輕啟戰端，不過在英蘇談判期中，他確使德國收回但澤，危脅波蘭，壓迫羅馬尼亞的行動，為之延滯，為之緩和。他知道這種和平，是一時的，他仍不願戰爭，所以英國對德國的關係，仍在設法改善。羅斯福的一電建議，使英國在企待德國緩和的空氣中，令韓德森返任，英蘇談判，為之延緩。及至德意軍事同盟成功，英國對德妥協的希望，仍未斷絕。哈立法克斯外相曾於五月末旬說明

英國的態度，反對以暴力變更歐洲現狀，對於當前問題，希望提出討論。德波問題，希望成立友好解決辦法，對於海約問題，仍願進行談判，經濟談判，仍然聽任實業界談判。自此，英國親德派的活動，即盛極一時。哈立法克斯之主張與蘇聯接近者，一時曾有在內閣小組會親德派中孤軍奮鬥的傳說，可見英國國內的政策，對於德國和解，以求取和平的企圖，仍未放棄。

在七月末時，報紙上又盛傳英國擬以十萬萬鎊借款，使德國縮減軍備，將軍需工業改為和平工業之說。這一消息傳播得極近真實。甚或有人提議將來戈林將軍到英國一次，即可決定。嗣後曾經兩國否認，不過英國的報界巨擘凱斯來，仍要到德國一遊。這裏面的任務，當然不如報載的簡單。

這些事實，都指明英國仍然沒有放棄與德妥協的企圖，只是這種妥協，不要表現成爲屈服於武力就得了。

對於意大利，英國仍然未忘情妥協。英蘇談判進行之際，張伯倫尚有親筆函致莫索里尼，可見一斑。

英土法土協定之真正意思，固在保衛近東與巴爾幹半島，但在英蘇協定進行之際，蘇聯外交特別繞道巴爾幹半島而至土耳其，與嗣後

所傳述的蘇聯擬組黑海沿岸聯盟，以及一再騰傳於報章之蘇聯通告土耳其，對於蘇聯擬組黑海沿岸聯盟，以及一再騰傳於報章之蘇聯通告土耳其，對於蘇聯擬組黑海沿岸聯盟，以及一再騰傳於報章之蘇聯通告土耳其，不放心英國的政策，而極思與之對抗。此外，如英報所傳土耳其擬與埃及組織回教同盟，波斯與阿富汗擬組織同盟等消息，都指明英國雖然與蘇聯談判同盟問題，却另外仍然設法組織包圍他的陣線。

法國的政策，大體上是跟隨英國走。無庸另述。

蘇聯的根本態度，是「不肯替別人從火中取粟子」，但是要求英法担保他的近鄰。他反對侵略者嗎？事實來必盡然。在歐洲反侵略呼聲最高時，他與意大利訂立商約，五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的演說，聲稱準備與德國恢復商業談判。在英蘇談判進行中，他派遣師多人到過被德國吞併的斯科達兵工廠去接洽軍火交易，目前德蘇商業談判，又行進行。柏林盛傳德國擬以五萬萬美金信用放款予蘇聯，莫斯科則傳為二萬萬馬克。這些事，都指明蘇聯雖然與英法談判同盟，但仍然不肯得罪德意。實際上，德意正是蘇聯的好友人。他們幫忙蘇聯向英法討價。在內政上，則又同是反資本主義的同志。

總之，蘇聯是為免除德國東進之威脅，特別是為免除英國有引導放任德國東進的威脅而與英法談判。英國則把與蘇聯談判當作了他消弭戰爭的可能原因，以爭取時間以便擴充軍備的手段之一，而與蘇聯談判。英蘇都在互相利用的前提下，虛與委蛇。

如果德國對蘇聯可提供出絕不東進的保障，則蘇聯很可以旁觀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而努力進行他的世界革命企圖。因此一方面，儘管英蘇在談判，另一方面蘇聯要緩和拉攏德國，使之西進，他又堅防英國在東歐與小亞細亞的封鎖陣線。蘇聯不信任張伯倫云云，只是一種避免負責任的口實。實際上，他自己便不能令人相信。

如果德國可以表示和平解決問題，或者德國絕對採取東進的策略，則英國又可袖手而觀蘇德的衝突，何必去保障波羅的海諸國。英國堅不肯保障波羅的海諸國的原因即在此，對於「間接侵略」，不肯接

受蘇聯定義的原因亦在此。

因此，在德國決定和平，或東進或西進前，英蘇談判仍然要以忠誠的商人態度在錙銖必較的講價錢。德國態度一經判明，則英蘇談判的成否與結果，立即判明了。如果德國態度，久不決定，而英國擴軍的結果，已使英人有了把握，德國絕不敢西進時，則英蘇談判中的主動者，將不復是張伯倫，而或許是史太林了。

再者，就英蘇談判中的各方所要求的權益，與應盡的義務的比重來看，似乎英法所享受者少，所担負者重。因為英法與德國西鄰的荷蘭、比瑞士、蘇聯都拒予以担保。英法兩國本身，如受直接侵略，蘇聯所能予以援助者，亦至為渺小。北冰洋的航路，尚是一問題，黑海與東中海，自然更是一問題。因此，法國前航空部長會就戰時蘇聯能給予英法援助，詳細分析過後，發見只有空軍，還可以為力。但是空軍數量與技術及補充，又成了問題。這樣，英法享受了些什麼呢？

在相反的方面，英法所保障的波蘭，羅馬尼亞，是蘇聯較強的鄰國，波羅的海諸國，更是蘇聯的毗鄰國，在地理位置上，蘇聯已然賺了便宜，英國最近貸款與波羅、土耳其耳，伴便重整軍備，這更增加了他們的抵抗力，也預先支付了對蘇聯的援助。自然，他們不願與蘇聯締結協定，使蘇聯難過一點。因此可以說英法之保障波羅兩國，實際上即保障了蘇聯。

由這兩點來看，在英蘇協定中，蘇聯已佔到便宜。很可照波蘭某軍人的說法，早些滿足了罷，不必等索價過高時，買主望望然而去之時，再要追悔。

由權利與義務比重方面來看，可知道英法義務較多；權益較少，真正的目的，似乎還不在於同盟，似乎還不肯真正參加戰爭，似乎也不肯「為他人從火中取粟子」，儘管波蘭與羅馬尼亞與英法也有特殊的關係，更遑論那幾個波羅的海小國。英法的真正目的，還在於爭取時間。

因此，我們說英蘇談判的作用，不在於軍事戰政治協定之訂定，而在於談判本身之延緩。目的達到，談判也就無需有結果了。

專 載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

汪精衛

總理孫先生告訴我們：「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這句說話意義重大。日本是東亞一個強國，經濟軍事文化著著先進，最近幾十年，可以說無日本則無東亞。中國事事雖然落後，卻是東亞一個地大人衆歷史深長的國家，如果要強盛起來，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國的強盛就於日本會發生什麼影響，於日本有利呢還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當然願意中國強盛，願意與中國爲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將中國強盛的動機打消了去，決定以中國爲敵。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

因爲這樣，中國革命若要成功，必須使日本知道，中國革命之成功，於日本有利，這不是權謀策略的，而是誠意的。怎樣纔能於日本有利呢，中國與日本外交方針一致，軍事方針一致，更進而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這樣中國的強盛，便於日本有利而無害。這是不是有損中國主權呢？絕對不是，因爲一個國家對於一個國家，因爲利害相同而相結合，絕對不是有損主權；這是不是有損第三國正當

權益呢？絕對不是，因爲中日的結合，爲的是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並沒有排斥第三國正當權益的意味。

十三年間，孫先生在廣州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那時候對於中日關係，是照著以上所述方針進行的。十四年間，孫先生逝世，我繼承遺志，主持國民政府，對於以上所述方針，兢兢業業，不敢少變。十七年間，便不然了，濟南事件爲中日關係惡轉的起頭，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結，中國此時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釋，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復歸於好轉，不幸當時國民政府計不出此，遂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更惡轉，由此一直至於九一八事變發生。

我說這話，並非有意責難當時主持國民政府的人，我是一個國民黨員，是一個與國民政府有關係的人，對於這種錯誤，我當然應該分擔責任。不過我要求讀者知道，我在當時是一個亡命者，是一個被國民政府通緝而飄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擔任行政院長，其後又兼外交部長，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來矯正當時「反對直接交涉」的論調，在我手裏先後訂定淞滬停戰協

定塘沽停戰協定。我當時的用意，仍是本於冤仇宜解不宜結的觀念，想從局部的暫時的安定，進而謀全國的永久的和平。我的主張，四年之間，並未達到，我絕不諉咎於人，我只自認才力不逮，事與願違而已。

但是我必反對一種論調，這種論調就是當時所謂主戰派，試問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戰的結果會怎麼樣，這不是以國家及民族為兒戲嗎？

我當初以為蔣介石先生與我是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蔣辭國民政府主席職後一篇告誡國人的文字，認為蔣與我同心，所以誠心誠意來與蔣合作，然而四年之間，我已漸漸的覺得不對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於大病之後，又受了三傷，身體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內，我遠適異國，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方纔趕了回來，則情形更加大變了。我當時只能牢牢認定剿共事業決不可中止，因為共產黨是只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的，他受了第三國際的祕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中日戰爭，這種大當斷斷乎上不得的，我當時的言論方針注意此點，讀者可隨時加以覆按。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於中日戰事，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對於共產黨的陰謀，也沒有一刻不想著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後最後，方纔於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

我的和平建議，是贊同日本近衛內閣聲明的。我為什麼贊同呢？我依然是向來一貫的觀念，對於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結。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國力，中國的民族意識，都已

充分表現出來，日本既然聲明，對於中國沒有侵略的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為什麼不也伸出手來，正如兄弟兩個廝打了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假使蔣能認識這是中國關係已到了一個新時期，毅然決然對於此聲明的大意，表示贊同，則中日和平途徑即可開展；更進而根據所謂三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條件，期於彼此交受其益，則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即可確定；此後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不難循序而得。不幸蔣不出此，反而用深閉固拒的態度，對付日本的提議，更用極端壓迫摧殘的手段，對付國內黨內的一切和平建議。以此之故，蹉跎半年，大局日益敗壞，不可收拾，這是真可痛惜的！

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原則，固然在近衛聲明中，方纔輪廓明白，但是數年以前，日本已經有此提議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有吉大使與蔣會見，曾經提出以三原則為改善中日關係之基礎，蔣表示贊同，并表示無對案。其後忽然翻覆：一則曰，那時是軍事委員長，不是行政院長，所說的話，不能算數；二則曰，那時是以私人資格談話，不是以公式談話；三則曰，所謂贊成者，乃是贊成對於三原則之討論，不是贊成三原則；四則曰，所謂無對案者，乃對於三原則之實施而言，絕非無條件的贊同：這是二十五年整一年中日交涉反覆停頓之原因，也是二十六年中日衝突終於爆發之原因。我們讀了當時的外交談話紀錄，只有浩歎。及至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一月，德國陶德曼大使調停戰事，所述日本政府的和平條件，何嘗不也是三原則？

我在「舉一個例」文中，已經說過，不必再述。至於近衛聲明，本其向來一貫的主張，爲系統的敘述，並且於我國顧慮之點，均已加以解釋，例如關於共同防共，因爲我國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於軍事內政，故聲明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關於經濟提攜，因爲我國顧慮政治糾紛尚未解決，故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并聲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有了這樣鄭重而明白的聲明，則三原則之實行，決無害於中國之自由獨立。不但此也，所謂共同防共及經濟提攜，其主要目的在使共產擾亂與經濟侵略兩大毒害絕跡於東亞，這等責任非常重大，日本既屬望中國分擔這等責任，則中國必須有充分之自由獨立，方能有分擔此重大責任之能力。自無待言。然則我們贊同此聲明，決不是苟求一日之安，而爲的是東亞的百年大計，然則我們爲何對於此聲明採取深閉固拒的態度？

在蔣統制下的宣傳，動不動說，日本正在以全力滅亡中國，所謂三原則，不過是一種托詞。這種宣傳，實在是不對的：第一，日本若要滅亡中國，則以全力繼續作戰便了，不必有所托詞；第二，三原則的提出，已歷數年，如上所述，自近衛聲明以來，更明顯的定爲國策，全國輿論，已趨一致，何以見得是托詞？第三，中日兩國如果沒有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因利害衝突之故，勢必至於水火不相容，反之，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利害一致，衝突自然無從發生，這樣的關係重大，如何可以說是托詞？第四，數年以來，中日關係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趨於惡劣，係誤於一種循環論

，例如日本說：中國排日，是九一八事變的起源，中國說：日本侵略是排日的起源，日本說：中國要拋棄以夷制夷政策，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中國說：日本要放棄對於中國的野心，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諸如此類，都是互相期待，互相責備，以致愈弄愈糟，如今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以同時著力，先期待自己，然後期待他人，先責備自己，然後責備他人，則進步必然較快，成功必然較易，如此做去，不但使中日過去的糾紛得以解除，現在的戰禍，得以結束及補償，而將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大道，也可以從此踏了上去。

然則爲什麼一定要拒絕和議而高調繼續抗戰呢？我們必須知道，抗戰以來，軍隊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識，這是不可磨滅的；然而同時我們又必須知道，這種民族意識，如今已被共產黨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識，在民族意識的掩護之下，來做摧殘民族斷送國家的工作，在共產黨是以爲當然的，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謂民族，有所謂國家。他只知接受第三國際的命令，要把中國來犧牲，犧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犧牲的人數，越多越好，犧牲的時間越長越好。中國固然犧牲個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創傷，這在第三國際看來，真個是一舉兩得。何況天從人願，抓著了蔣來做幌子，以盡情發洩十六年以來「剿共」的仇恨，等到盡情發洩之後，他自然會回到他的第三國際老家去，用不著一些留戀。因爲這樣，所以三番幾次得著了恢復和平的機會，偏要說抗戰到底，這就是說中國永遠得不著和平的，非替第三國際犧牲到底不可。總而言之，共產黨的罪惡，浮於義和

拳，而為共產黨利用的人，其罪惡又浮於剛毅諸人之上，雖然尚有忠勇的軍隊，忠勇的人民，至多不過如聶士成一般，只能盡自己報國的心事，決不能挽回當前的劫運，不如學劉坤一張之洞之保障東南，李鴻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國聯軍槍桿之下，成立和議，或者還可補救一些。

我覺得今日有兩條路擺在面前：一條是跟著蔣高調繼續抗戰，以盡現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並且不足以控制共產黨，以蔣現有的環境，雖欲不跟著共產黨而不能，

怎樣實現和平

八月九日在廣州廣播演講

汪精衛

各位同胞：如今我在廣州向你們廣播，眼睛裏雖然看不見你們，心神早已和你們在一起的，如今身體也和你們在一起了，說不出的感動，說不出的興奮！

七月九日我曾經廣播一次，題目是「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當時沒有將廣播地點說出來，有些自命高調的人，說我定然在淪陷了的地方失了自由了。我如今告訴各位，我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之後，沒有離河內一步，我當時實在盼望蔣介石肯替國家民族着想，接受我的建議。等了幾個月，知道這盼望是徒然的，可是國家民族不能不救，於是開始奔走。當奔走的時候，我沒有通知藍衣社的義務，自然只好把行跡秘密起來，不但當時如此，以後如有必要也是如此。如今我第一句要問的：我為什麼不可以走到淪陷了的地方？須知道在戰時一個人所能站着

這樣下去，只有以整個國家民族跟著蔣為共產黨的犧牲，另一條路是把總理孫先生的遺志重新闡明起來，重新行起來，對於日本，本著冤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義，努力於轉敵為友，第一步恢復中日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這兩條路，前一條是亡國滅種的路，後一條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我決定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一條路走，我決定團結同志並團結全國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有志之士，來共同走上這一條路。

的地方，不外以下幾種：一是前方，一是後方，一是淪陷了的地方，一是外國。可是中國人呢，卻多了兩種：一是租界，如上海、天津等；一是外國的殖民地，如河內、香港等。我並沒有鄙夷住在這兩種地方的人，我以為只要看他的目的和他的言論行動。如果他的目的和他的言論行動，時時刻刻是替前方後方及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着想，時時刻刻想解救，那麼他的努力，毫無分別。如果他以為現在托庇在帝國國主義勢力之下，站在風涼地方來說風涼話，我自然鄙夷他。

在前方後方的民衆心事是這樣的呢？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為什麼不可以講和平？然而在蔣介石及共產黨壓迫之下，「講和平的是漢奸」，這些民衆，只有

在壓迫之下，一聲不響，由他擺佈，至死為止。我們想到這裏，只有用盡方法，把這些前方後方的民衆解放出來。

至於在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呢，他們心神，與前方後方的民衆，是不可分的，不但心神如此身體也是如此，所謂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他們當然講和平，並且熱烈的追求着怎樣實現和平。

就廣州來說，在去年十月以前，民衆所聽到的是當局叫人民安心，日本軍隊斷斷不能來到，直至十月初旬。還是如此說。及至日本軍隊將要來到了。當局帶領軍隊先走，將民衆丟下，而臨走時候，還要放一把火，把民居商店燒個精光，這是廣州民衆處在前方後方地位的時候所身受的至於丟失了燒剩了的，在當局看來，只有恨他死不盡，燒不光還不斷的唆使土匪，用游擊的名義來繼續焚燒搶掠的工作；這是廣州民衆處在淪陷地位的時候所身受的。當局爲什麼如此呢？是奉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爲什麼如此呢？是奉共產黨的教條。試問這些犧牲有得到一點代價沒有？當初燒的時候，日本軍隊不會因此而不來；燒了之後日本軍隊來了也不會因此站不住。試問這一場燒，除了燒死人民，燒絕了人民生命所寄託的財產，還有其他什麼意義？廣州燒了還不算，武漢臨去的時候，也照樣的一道命令要燒個精光。因爲奉令的人於心不忍，燒得不甚徹底，因此索性長沙於未去以前，就徹底的大燒特燒之外，還要帶着游擊隊零零碎碎的燒，要使全國都變成瓦礫，變成灰燼。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

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而且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爲什麼一定要把民衆趕上了死絕的路上去？這些呼聲，在前方後方的民衆被箝著口發不出來；可是在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卻已發現出來了。我爲什麼走到淪陷了的地方來？我是爲這種呼聲所召喚，我是要將這種呼聲與前方後方被箝著口發不出來的呼聲連結在一起！

我第二句要問的是：爲什麼我走到淪陷了的地方便會失了自由，我既然下了決心，走到這地方來，難道連『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道理也不懂得？我只會死，絕不會失却自由。不但此也，我時時刻刻準備着以我的生命換取同胞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換取同胞的自由。

以上兩句要問的話已問完了，如今要說的是怎樣實現和平？這似乎很繁複，其實很簡單。只要蔣介石看得國家民族比他個人重要些，遵守孫先生大亞洲主義的遺教，接受日本關於和平的聲明，那麼全國停戰，立即可以實現，跟着和平談判，就可開始。在和平談判中商量各種問題，如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等，都根據原則以謀具體條件之折衷至當，於是全國所渴想的撤兵，必可以做到。試問怎樣，豈不是一件極簡單的事？

但是蔣介石，既然看得他個人的利益大於國家民族的利益，當可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獻給受第三國際指揮的共產黨，以爲西安事變替他個人救苦救難之酬勞品。明明白白和平有了希望，而且這和平明明白白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他偏要悍然不顧的加以反對。這樣一來，和平的實現，便遇着極大的阻礙了。

然而要除去這極大的阻礙也有方法，而且這方法並不繁複，實在簡單得很。只要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明白了和平有了希望，而且這和平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破除了蔣介石的欺騙宣傳，擺脫了蔣介石的箝制力量，第一步公開的贊成和平，在自己力量所及之地，肅清共產黨的一切陰謀罪惡。保衛地方的治安，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的安全；第二步將贊成和平的聯合起來，公開的要求蔣介石以國家民族為重，不再做和平的阻礙。這樣和平的實現，在短期間內，必然普遍全國。由和平實現而得回獨立自由，由得回獨立自由而奠定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基礎。復興中國，復興東亞，必由於此。

或者有人會提出疑問道：假使我們有這樣的表示，而日本軍隊仍然進攻，那麼，不但和平會成泡影，而且徒然懈怠了軍心，散亂了人心，豈不為害甚大呢？我如今鄭重的明白的答復道，如果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著軍隊的人，能有贊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則日本軍隊必不會進攻。因為日本政府，已有聲明在前，盼望中國有同憂具眼之士出而收拾時局，以復興中國，以進而分擔復興東亞的責任。因此，日本軍隊，決不會向著我們和平反共的地方及軍隊進攻的。現在我在廣州與安藤最高指揮官會晤，關於怎樣實現和平，彼此互相披瀝誠意。其結果使我確信，如果廣東方面的中國軍隊，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揮官，必能以極好友的考慮實現以下幾件事：即是不僅對於這種軍隊立刻停止攻擊，而且更進一步將日本軍隊已經佔據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備，以及行政經濟，都從日本軍隊手裏，次第交還中

國。因此我今日敢公開約束：如果廣東方面的行政當局和軍隊，能贊成我的和平主張，則我必能得安藤最高指揮官的同意，先在廣東做起部分的停戰，而以次及於全國，使全國和平得以完全恢復。尤其是對於廣州市民，我敢說在最短期間，必能以廣州市還之廣州市民之手，使廣州市成為比較去年十月以前更有秩序，更有幸福的地方。

各位同胞：聽到了我這篇廣播之後，可以知道我所謂和平可以實現，而且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不是一種空想，而是早晚可以證明的事實。各位同胞：你們不是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啊！你們從前曾經盡了前方後方的責任，忍受許多痛苦許多的犧牲，及至蔣介石將你們丟了之後，還要加你們以種種惡名，恨你們死不盡。燒不光，加你們以種種惡名，好將你們繼續的燒，繼續的送往死路。蔣介石不是以日本為敵，是以中華民國的衆民為敵！蔣介石在今日已為和平之唯一阻礙者，你們只有將這阻礙除去，你們必然能洗卻了種種惡名，而重新做中國復興之柱石，進而做東亞復興之柱石。

各位同胞：我知道我廣播了一篇談話之後，蔣介石必然逼迫各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著軍隊的人發出聯名通電來攻擊我，但我知道這是無效的。只要和平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而且可以為復興之基礎，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阻礙和平之實現！